

第一 编

导 论

► 大卫·A. 鲍德温

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 David A. Baldwin

1986 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编撰了一卷名为《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的书。该书集中探讨了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 1979) 对国际政治传统现实主义的重新思考, 以及不同学者对沃尔兹思考的反应。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国际体系结构对民族国家行为的影响, 沃尔兹重塑了经典现实主义的信条。而且, 沃尔兹认为, 在把权力和国家作为体系的单位方面, 他与早期的现实主义者不同(Waltz 1979; 1990)。根据基欧汉的观点(Keohane 1986a, 24), 对沃尔兹的理论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希望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目的。这些批评者主要探讨的是设计新的国际体制或制度、重新解释主权原则或挑战新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国家作为行为体模式的有效性。还有一些学者呼吁, 应该更多地注意经济和环境领域的相互依赖和政府功能, 以及信息和国际制度等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其他一些学者则攻击沃尔兹理论的认识论。

从某种程度上说, 本书是《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的继续。然而, 不像前书, 本书的各位作者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和目标的基本假设方面, 存在许多共识。这使他们可以直接与别人的观点衔接, 同时又保证了争论的集中性和建设性。

最近几年对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有时称结构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最有力的挑战, 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t) 的出现而加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称谓与早期各种自由主义, 如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 、共和自由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 和社会学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 有区别 (Nye 1988, Grieco 1988a: 448n; Keohane 1990a)。商业自由主义是指将自由贸易与和平相联系的理论; 共和自由主义是指把民主与和平相联系的理论; 社会学自由主义是指把跨国交往与国际一体化相联系的理论。当前自由制度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属于国际制度理论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Krasner 1983a) 。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当前争论的主题

当前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争论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

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在什么是无政府状态以及为什么存在无政府状态等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分歧。亚塞·斯坦 (Arthur Stein 1982a: 324) 区分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各个国家独立政策的形成和国际制度中共同政策的形成。他指出，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个自治国家的自我利益促使它们建立国际制度。查尔斯·利普森 (Charles Lipson 1984: 22) 指出，无政府状态的观念是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¹⁾，但他认为，在否认国际相互依赖重要性的问题上，新现实主义者过分夸大了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性。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 Axelrod) 和罗伯特·基欧汉强调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性在于缺少政府；但他们也认为，世界政治的持续性特点，在于允许国家互动的各种模式存在。约瑟夫·格里科 (Joseph Grieco 1988a:

497—498)认为,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体现在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等方面。他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低估了国家行为动机中对生存担忧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 1991:70,81—82)认为,对纷繁复杂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特征的发现,可能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成就。但她也同意利普森的观点,即认为新现实主义过分强调了无政府状态观点,忽略了相互依赖。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 1991b)把囚徒的困境当做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观念的例子,而格里科(Grieco 1988a)则把囚徒的困境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总体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更强调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严格限制作用。

国际合作

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双方都认为国际合作是可能的,但两者的分歧体现在合作发生的条件与合作的可能性两方面。根据后文中格里科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者相比,新现实主义者为国际合作“更难实现、更难维持和更依赖于国家权势”。本书中没有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反对这一论断。基欧汉和格里科都认为,欧共体的未来将是对他们理论的重要检验。如果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弱化或者发生逆转,新现实主义者将会要求辩白。如果一体化继续前进,新自由主义者将认定这是对他们观点的支持。

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对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s)

有关相对获益的观点可能导致错误地产生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两派学者中的一方仅关注相对获益,另一方仅关注绝对获益;也就是说,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合作中的绝对获益,新现实主义者强调相对获益。本卷书的好几位作者,都提

及了新现实主义代表人沃尔兹的一段话：

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的时候，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比如说，以 2:1 的比例进行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的获益，去实现意在损害或者毁灭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不会引发合作 (Waltz 1979 :105)。

斯坦(Stein 1982a:318)把自由主义关于自我利益的观点，描述为享有共同利益的行为者，试图将它们的绝对获益最大化。他认为，如果行为者试图将其相对利益最大化，那么共同利益就不存在。利普森(Lipson 1984:15—18)认为，在安全事务中，相对获益的考虑比在经济事务中显得更重要。格里科 (Grieco 1988a:487)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沉迷于国际合作中现实的或潜在的绝对获益，而忽略了相对获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 (Grieco 1988a:498)。斯奈德(Snidal 1991b)怀疑新现实主义相对获益阻止合作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两极体系中的相对获益关注，可以作为特例。同时，他还认为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界线分明。相对获益问题可以用长短期绝对获益之间的平衡来表达。鲍威尔(Powell 1991b)使用演绎的模式，考察了军事力量使用性高的时候，相对获益将阻止合作的情况。⁽²⁾马斯坦丹诺(Mastanduno 1991)利用经验中的个案研究，提出了是否存在相对获益以及如何获得相对获益的问题。他的结论给争论双方都提供

了一些支持。他所考察的三个个案的每一个决策程序，都显示了对相对获益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并不反映在每一个个案的政策结果中。基欧汉在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中也承认，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过分低估了在一定条件下世界政治中的相对获益问题。根据基欧汉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去仔细地解释这些条件。但他也指出，既然国家追求相对获益的行为，与国家寻求绝对获益的行为非常类似，那么对条件的解释会很困难。

国家的优先目标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福利两者都很重要。但他们的分歧在于何者更加重要。利普森 (Lipson 1984) 就认为，经济事务领域比军事安全事务领域更可能实现国际合作。既然新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研究安全事务，新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们对合作难易的不同估计，将毫无疑问与他们所关注的不同事务领域相关。格里科 (Grieco 1988a) 就认为，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关注相对权力、安全和生存。鲍威尔 (Powell 1991b) 设计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意在强调经济福利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调安全的新现实主义两者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他的模式中，国家被假定为处在一个到处是军事力量的世界中，试图将其经济福利最大化。在大部分时候，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通过假设来对待国家目标。正如基欧汉(在后文中)指出的，在预测利益的时候，没有一种理论是有效的。

意图(intentions)对能力(capabilities)

经典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把根据政治家的动机来理解外交政策的方式看做是一种谬误。相反，他赞

同政治家是根据权力限定的利益来思考和行动的这种假设 (Morgenthau 1967:5—6)。他相信,通过这种假设,比通过考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政治家们更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虽然当代的新现实主义者并不坚持这种极端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倾向于更强调能力而不是意图。格里科(Grieco 1988a:498,500)就指出,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关注,将导致政治家们密切地关注能力,因为能力是他们安全和独立的最终基础。克莱斯勒(Krasner 1991)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批评新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意图、利益和信息,忽略了能力的分布。基欧汉(后文)认为,国家对其他国家相对获益的敏感性深深受到该国意图观念的影响。因此,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敌国而非盟国的相对获益。斯坦(Stein 1982a)则用成员国的偏好模式,对国际制度进行了解释。根据他的分析,能力仅仅是作为影响国家意图和偏好而言的。关于能力和意图两者何者更加重要的分歧,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争论焦点。

体制(institution)和制度(regime)

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1945年以来出现了太多的体制和制度。然而,他们的分歧体现在这些安排的重要性方面。根据基欧汉的观点,当代争论的许多方面体现在这些国际制度和体制的有效性方面,更广泛地说,是体现在世界政治的重要性方面。新现实主义者也同意这是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制度的内容,以至于认为制度能够缓和无政府状态对国家间合作的限制(Grieco 1988a:485)。

上述六个方面不仅是两种理论争论的主要分歧所在,而且也有助于读者辨明主要观点。本卷书的每一位作者并没有都对上述

(3)

Krasner 1991

E. H. Call 1946:11)

Claude Morgenthau 1967:4) • Inis L.
balance of power

1962 39)

Claude

conservatism)

(4)

修昔底德(Thucydide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现实主义思想前辈大师经常被提及。

同样地,也有强调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国际交往和社会规则的思想家。古代的斯多葛派(Stoices)学者把自己当做世界公民的观念,可以看做是对世界政治中国家中心论的挑战。早期的基督教哲学家相信,神授予不同的地区有限和不同的产品(products),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进行贸易,这样,通过世界经济使他们变成统一的世界社会,变成统一的神的孩子,学会互爱(Viner 1937:100)。

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这些控制 17 和 18 世纪国际思想的人,他们把权势和财富看做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范畴。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收益是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他们强调对战争的准备和对相对获益的关注。重商主义者可以看做是后来现实主义者的先驱。⁽⁵⁾

当代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最类似的对应情景,可以在 18 世纪的哲学作品中找到。当时的先哲们攻击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他们提出世界文明和世界公民的思想,提出国内事务比外交事务优先的思想,要求放弃军事联盟、反对以均势求和平的思想。他们强调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拥护自由贸易,认为这样可以阻止战争(Russell 1936; Gilbert 1951, 1961; Hinsley 1963)。

进入 20 世纪,伍德鲁·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为这种思想的持有者。他坚持通过自由贸易和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来促进世界和平。根据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的观点“从启蒙运动到威尔逊是一条思想线索,威尔逊的‘新外交’思想深受 18 世纪观念的影响,他继承并发展了这些思想观念”(Gilbert 1951:37)。

国际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出现,特别是在美国。福克斯(William Fox)把这个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一种梦

幻。在这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利益是和谐的，通过增进相互理解和国际制度可以消除世界战争的梦魇(Fox 1949)。他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一连串的失败事件，是与 20 年代国际关系学术界产生的期望一致的(Fox 1949:67)。对满洲（中国东北）的侵略，《莫洛托夫 - 里宾特洛普协定》的签订，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制裁意大利的失败，这些事件使国际关系学者们的梦幻破灭，当代现实主义的种子由此而萌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范式。虽然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论出现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但那时真正宣称理想主义者的政治科学家很难找到（Fox1989: 239； Woifers1949； Herz1950； Morgenthau1952； Wright1952； Cook and Moors1953； Schilling1956）。尽管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在 40 年代，功能主义被看做实现世界和平的方法（Mitrany1943； Claude1956）。欧内斯特·哈斯(Ernst Haas)《欧洲的统一》在 1958 年出版，哈斯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引起了 20 世纪 60 年代对地区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的许多研究。

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争论开始形成。在自由主义方面有三部特别重要的作品：1971 年论国际组织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Keohane and Nye 1972) 基欧汉和奈 1977 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和 1982 年出版的论国际组织事务方面的《国际制度》(Krasner 1983a)。第一本书提出了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观点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诸如罗马教廷、福特基金会和跨国企业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在第二本书的导言和结论中，基欧汉和奈明确地挑战了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行为者的许多前提假设：军事安全在外交事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事务性领域中权力资源的替换性。克莱斯勒

主编的第三本书，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观点出发的。

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新现实主义三部特别重要的著作包括 肯尼思·沃尔兹 1975 年的《国际关系理论》，1979 年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约瑟夫·格里科 1988 年的《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第一本书是第二本的初版，后者成了新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正如 20 世纪 50 年代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是现实主义的里程碑一样。第三部书从新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认真剖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它也被收入本书。

尽管自从修昔底德论伯罗宾尼撒战争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现实主义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思想，但不同的观念一直存在。当代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虽然不同于以往，但仍然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争论。

为了理解这次争论的思想背景，下面三部分将对各位作者提出的观念和理论问题进行评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使用的两个基本的概念是无政府状态和权力。下面两部分内容意在给读者指出这些概念本身带来的困难。

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秩序

长久以来，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一直重视无政府状态观念的重要性，但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承认这种重要性。然而，本卷书中的大部分新自由主义作者，都承认无政府状态假设的重要作用。但读者不能因此就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无政府状态的意义和后果方面观点一致。

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是政治著作中一个最需要留意的词语。它常常被用来指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式的人反对人的战争状态。

然而，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承认世界政治中存在一定秩序，尽管他们在秩序的性质、范围和形成的原因等方面观点并不一致。许多理论家都把无政府状态定义为缺少政府。然而，这个定义又引出政府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政府运作的许多行为，在国际层面都有对应物。例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管理经济事务、解释法律、规范商业、管理邮政、规范航空、提高公共卫生和确保公共安全等方面，在国际层面都有其相似的对应内容。赞同以缺少政府来解释无政府状态的这种观念，是指在国际层面缺少政府的一些明显特征。正如后文中米尔纳指出的，大家都同意把无政府状态界定为国际关系中缺少明显的政府特征。

读者不但应该细心地审视不同的作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而且要考察他们对其后果的叙述。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应该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即作者所叙述的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是否能从他的无政府假设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或者这一假设是否应该当做经验的假设来看待。在这些方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存在混乱的地方(Milner 1992)。

社会科学家试图找出社会现象中存在的普遍规律。当被要求解释某种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科学家总想寻找这种现象实例。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可能也源于这种问题。可以把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解释看做社会秩序普遍性问题的亚类。国际关系领域以外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将为其提供有益的视野。如肯尼思·包尔丁(Kenneth Boulding)就认为，在家庭层面产生秩序的三个社会机制，也会在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体系层面产生秩序(Boulding 1963; 1978; 1989)。他把这三个机制称做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威胁体系(threat system)和观念一体化(image integration)。第一个强调酬赏 第二个强调惩罚 第三个强调利益和观念的和谐性。根据包尔丁设想，所有社会体系的存在，

都依赖于实现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进程之间的某种联合。

很容易看到国际层面中每一进程的例子。交换进程是与贸易、经济相互依赖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研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威胁体系是与遏制和类似新现实主义特别关注的利益现象联系的。观念一体化进程是那些研究信息偏好、学习和误解的领域。包尔丁的理论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模式有助于世界政治中秩序问题的研究。它表明，一个简单的模式如何被新自由主义用来强调经济相互依赖、被新现实主义用来强调军事遏制、和被心理学家用来强调信息偏好。

能力和合作

沃尔兹指出,尽管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但如何对它进行恰当定义,仍然存在争议(Waltz 1986:333)。另一个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认为,权力概念是国际关系领域最混乱的概念之一(Gilpin 1981:13)。因此,他认为,如此之多的不同定义,应该是政治科学家的耻辱(Gilpin 1975:24)。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权力并不起最关键的作用,但该理论对权力提供的解释也是混乱的(Baldwin 1989)。因此,本书的读者应该辨别一些有关权力分析(或能力分析)的问题。这包括权力的特定范围和领域、零和博弈问题和替代性问题等。⁽⁶⁾

范围(scope)和领域(domain)⁽⁷⁾

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在争论国际政治中相对获益问题时,有时忽略了他们所关注的获益问题的特定内容。通常,获益指的是能力方面的内容。然而,这个答案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能力使谁做什么?

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概念最普遍的看法，是把权力当做一种因果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体现的是权力的使用者对另一行为者行为、态度、信念和偏好的影响。正如内格尔指出的，任何人在使用权力这一概念的时候，都应该规定其特定的范围和领域 (Nagel 1975:14)。这很容易看到作者是否把“A 国有权力”重新表述为“A 国引起”的措辞。后一措辞引出的疑问是：什么影响 A 国促使谁采取某种行动。实际上，没有回答上述问题的定义，都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指出的是，对范围和领域的要求，在于仔细或清楚说明不包含什么的特定层面。因而，“美国有使伊拉克放弃它的核武器的权力”和“美国有使许多国家做许多事的权力”这两种表述是符合要求的。虽然“许多事”这一措辞比较空泛，但它确实最低限度地满足了对一次有实际意义的临时权力关系的表述要求。

沃尔兹拒绝临时的权力概念，并提出“某人拥有权力这个古老而简单的概念”是指“他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他”(Waltz 1979:192)。然而，沃尔兹的这种替代性建议，并没有减少对权力的范围和领域进行界定的需要。就范围而言，必须表明什么影响权力。就领域而言，必须表明哪些内容被影响。⁽⁸⁾一些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为了避免对范围和领域的界定，在他们的理论中使用能力（或者权力资源）这样的术语。实际上，这仅仅是把分析的中心，从实际的原因转向潜在的原因。任何政治家对国家能力的估计，都是建立在预测某种方式对其他国家影响的基础上的。一国拥有赢得反对许多国家的战争能力这样的观测报告是有意义的。关于一个国家有很大能力的观测，产生了“能力使谁去做什么”这两个关键问题。没有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某种形式的解释，任何有关能力的要素论述都没有意义。

沃尔兹(Waltz 1979:131)认为对国家能力的计算，可以根据